



风范永存
励后学

道承中华血脉 学传华夏人文

社会各界人士和师生送别张岂之先生

本报讯 2026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侯外庐学派的主要成员和传承者、创新者，西北大学名誉校长、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张岂之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西安市殡仪馆举行。

张岂之先生因病于2026年7月19日17时24分在西安逝世，享年100岁。

张岂之先生逝世后，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对张岂之先生逝世表示哀悼，向家属表示慰问并敬献花圈。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领导同志，省委、省政府、省政协主要领导同志，有关省领导同志，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主要负责同志发来唁电唁函或前来吊唁、敬献花圈、向家属表示慰问。

23日上午，西安市殡仪馆咸亨厅庄严肃穆、哀乐低回，厅外正门上方高悬黑底白字横幅“沉痛悼念张岂之先生”，厅内前方正中是张岂之先生的遗像，两侧悬挂挽联“道承中华血脉，学传华夏人文”，屏幕上循环播放着先生的生前影像，引发在场来宾的无限追思。张岂之先生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全国工商联，省委、省政府有

关部门，兄弟高校，相关学术组织负责同志，西北大学校领导、退休老领导、校内各单位师生代表，学校各地校友会代表、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张岂之先生亲属、同事、生前好友、家乡代表、学生等600余人参加告别仪式。

10时许，遗体告别仪式开始，由校长孙庆伟主持。校党委书记蒋林介绍了张岂之先生生平 and 卓越贡献。他表示，先生始终秉承浓厚的家国情怀、纯粹的育人初心、坚定的文化担当，为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文化事业倾注了满腔赤诚与毕生心血，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先生的丰厚学术遗产与崇高精神品格，永远激励着我们。张岂之先生的学生、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深情追忆跟随先生求学问道的点滴往事，表示将铭记先生谆谆教诲，沿着“兼和、守正、日新”之路坚定前行。张岂之先生长女张慧代表家属对社会各界给予的关怀惦念表示诚挚感谢。

现场来宾怀着沉痛的心情肃立三鞠躬，依次缓步绕行，瞻仰张岂之先生遗容，向先生作最后告别，并与先生亲属一一握手，致以深切慰问。

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全国政协办公

厅、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政协陕西省委员会、陕西省纪委监委，以及陕西省委办公厅、省委组织部(省委人才办)、省委宣传部、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省文物局、省社科院，青海省社科院，西安市委、市政府，安康市委、市政府等单位，张岂之先生家乡南通市委、市政府，如东县委、县政府发来唁电唁函，敬献花圈，表达哀思。

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哲学史学会等50余个学术组织、文化机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50余所高校及相关研究机构，张岂之先生的母校重庆南开中学、西安北京大学校友会、西北大学校友总会及海内外70余个校友分会，知名专家学者、张岂之先生的学生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和慰问。

张岂之先生的逝世，是西北大学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的重大损失。先生德范千秋，永励后学。全体西大人将化悲痛为力量，继承先生遗志，弘扬先生精神，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开拓创新、砥砺前行。

(党办校办 思想所)

华夏文脉的守望者

□ 熊晓芬

2016年10月29日晚，“致敬国学：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上，一位鲐背之年的老先生获得“全球华人国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盛赞他：“六十年治学路，他师承大家耆宿，延续老北大传统。从思想到文化，由史学而哲学，沿着文脉施施而行，追溯学说源流，探寻文明播迁，综贯会通，熔铸古今，写就一部浩荡思想史。”

这位老先生，就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张岂之。张岂之先生曾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我们要坚守它，我们要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要做好传承工作。国学不是为古而古，为今而古，为未来而古，要做到古为今用。我如果生命还能延续下去，还要在这六个字上下功夫：传承、创新、发展。”

言犹在耳……

2026年7月19日，张岂之先生走完了百年漫漫人生路，溘然长逝。噩耗传来，人们陷入无尽的悲痛——中华民族失去了一位学术泰斗、思想巨擘，西北大学师生永远失去了敬爱的老校长。

一段延续74载的缘分

身姿瘦削挺拔，面容清癯谦和，谈吐渊博机敏，总是风度翩翩的张岂之，在人们的印象里，是典型的南方知识分子形象。而这位1926年出生于江苏南通的才子，却与地处黄土高原、坐落在古城西安的西北大学结下了74载的缘分。在这里，他从书斋走上讲台，将毕生精力投入到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和文化素质教育研究中。在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同频共振中，治学治校、教书育人。而这份珍贵的缘分，源自他的导师、另一位深受西北大学师生爱戴的“老校长”——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思想史家和教育家侯外庐。

1937年，日寇入侵，战火纷飞，年仅11岁的张岂之跟随母亲转移至陕西西城固，就读于西迁至此的北平师范大学附中。在汉江边，张岂之受教于一群在国破家中中仍然努力教书育人的老师。随后他又辗转至重庆，就读于张伯苓创

办的南开高中。

高中生张岂之读了很多课外书，喜欢写白话诗的他决心毕业后报考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或史学。1946年夏，已经从昆明迁返平津的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联合招考本科生，张岂之考取了北大哲学系。

读书时，张岂之是北大本科生中最优秀、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在任课的老先生们眼中，张岂之是他们遇到过的异常用功的学生。从1949年北平解放到1950年夏，北大哲学系师生学习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蔚然成风，张岂之和同学们一起去听侯外庐先生主讲的“中国思想史专题”。一个学期下来，能坚持听下来的学生寥寥无几，而张岂之却是每课必至，并对中国思想史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作为《资本论》最早的中译者，侯外庐始终不渝地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研究中国历史，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确立和发展，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学派的构建，作出了大量的开拓性贡献。他与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一起，被学界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聪敏好学又勤勉的张岂之，给侯外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0年，张岂之考入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攻读研究生。1952年秋，已任西北大学校长的侯外庐捎来口信，邀请张岂之赴西安工作。张岂之欣然前往，跟随侯外庐先生从事中国思想史学科的研究拓展和教学工作，开启了他与西北大学长达74年的缘分。

随后，侯外庐奉调北京，筹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并成立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张岂之成为研究室一员，半年在京工作，半年回到西北大学教书。

1953年，侯外庐带领张岂之、李学勤、杨超、林英、何兆武等5位青年，校对、修订、增补《中国思想通史》第一至三卷。工作完成后，侯外庐又带领他们立即着手第四卷的编写，并为他们起了个集体笔名“诸青”，即“诸位青年”。“诸青”有理想，文史功底比较厚，有着勤奋、朴实的共同

特点，其中“岂之”哲学基础扎实，归纳力强；学勤博闻强记，熟悉典籍；杨超理论素养突出；林英思想敏锐，有一定深度；兆武精通世界近现代史，博识中外群籍。”编写任务无疑是艰巨的，对张岂之等人来说，更是极大的锻炼。初稿由侯外庐认真审阅，多次修改，甚至数次推倒重来。“我们常和侯先生深入交谈，甚至争论。他写成的稿子，我们有时也做文字修订，甚至是观点的修改。他从不愠怒，还吸收了我们的不少意见。”编写的过程累并快乐着，既有耗费无数心血的辛劳，更有所收获的喜悦。让张岂之最感珍贵的，是师生之间互为师长、取长补短的平等交流。历时3年，大功告成，加上据侯外庐著作《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修订而成的第五卷，全书于196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思想通史》洋洋260万字，被评价为“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分量最重、水平最高、成就最大、影响最广的里程碑式的通史著作”，畅销至今。

为“侯外庐学派”开天拓地

侯外庐先生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解读中国历史、中国思想史，开辟了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新思路。他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研究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形成了研究中国历史的独特路径与特点，为后来者树立了运用马克思主义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典范。在20世纪众多史学家中，侯外庐先生独树一帜，在很多方面自成体系。

张岂之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曾经指出：“侯外庐学派最显著的特色，是重视科研人才的培养，长期在科研实践中培养人才。”在侯外庐先生身边工作的时间里，先生曾问他们：“是到水中去学游泳，还是在岸上读《游泳指南》，根本不下水呢？”侯外庐不仅要求青年教师要“下水学游泳”，还“层层加码”给他们不停地压担子。在《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编写完成后，“诸青”都惊异于自己居然完成了那么多工作，“唱了重头戏”。正是在“下水游泳”和“层层加码”之下，张岂之等人在教学科研中迅速成长起来。

1980年，侯外庐将编著《宋明理学史》的计划委托于邱汉生和张岂之领军执行。张岂之不仅撰写张载、罗钦顺等章节，而且投入巨大精力和时间组织作者、商定提纲、修改稿件、统一体例。整整6年，凝聚了天南地北近20位年轻学者智慧的文字终得定稿。1984年，《宋明理学史》上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6月，《宋明理学史》下卷出版。这部共计130万字的皇皇巨著，是首部运用唯物史观系统阐释宋明理学发展全程的学术经典著作。1995年获原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1999年获国家社科基金成果二等奖和首届郭沫若史学奖荣誉奖。学界普遍认为，《宋明理学史》的编著和出版，客观上标志着侯外庐学派顺利地完成了从第一代到第二代的传承与发展。

1989年，张岂之主编出版《中国思想史》，研究范围上自殷周，下至五四，实现了从远古至现代的中国思想史通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中国思想通史》未竟的事业。1999年始，张岂之主编6卷9册《中国思想学说史》，历时8年，探索将思想史与学术史结合，对中国思想史的演变提出了符合中国文化原貌的解析，被评价为

岂止研经，七十载笔耕史苑，文光长照周秦道；之乎立教，万千春雨润杏坛，师德永留西北园。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侯外庐学派的主要成员和传承者、创新者，西北大学名誉校长、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张岂之先生，走完了百年漫漫人生路，溘然长逝。中华民族失去了一位学术泰斗、思想巨擘，西北大学永远失去了一位好老师、大先生。

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张岂之先生1926年10月出生在江苏南通。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50年考入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读研究生。1952年赴西北大学任教，195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校长、校长、名誉校长。张岂之先生是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陕西省首届社科名家、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会长，全球华人国学终身成就奖、汤用彤学术奖获得者。1994年起受聘为清华大学双聘教授。

《左传》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张岂之先生始终秉承浓厚的家国情怀、纯粹的育人初心、坚定的文化担当，为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文化事业倾注了满腔赤诚与毕生心血，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全体西大人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先生遗志，弘扬先生精神，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开拓创新、砥砺前行。

要学习和继承张岂之先生的治学精神，崇文弘道，承古拓新。张岂之先生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探索人和先行者。他在学术研究与通识教育教学中提炼出中华人文精神七大精髓，系统概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十二个核心理念，为理解中华文明精神内核、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了完整理论框架；主持和指导的陕西省轩辕黄帝研究会、黄帝文化论坛等，在黄帝与黄帝陵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精神研究与普及等领域取得显著成绩，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他承继侯外庐先生的学术道统，担任中宣部、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史学概论》《中国思想史》首席专家，独著、主编各类著作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脉，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魂脉，我们要继续推进

二者的结合、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蓄文化力量。

要学习和继承张岂之先生的育人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张岂之先生最看重的身份是“老师”，总想着“既然是教师，做的一切就一定要对学生有用”。他1978年任副教授，1980年任教授，1984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1984年，中国思想史获得专门史(中国思想史)博士学位授予权。他主编的《中国历史》《中国思想史》分别获得国家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带领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团队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和博士后500余名，均已成为思想文化研究与教育领域的骨干力量。我们要始终牢记人民教师无上光荣，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科学家精神，把优良师德师风贯穿课堂教学、科学研究、社会实践各环节，既当“经师”，又当“人师”，争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

要学习和继承张岂之先生的改革精神，开放合作，锐意进取。张岂之先生1983年任西北大学副校长，1985年任校长。他抢抓改革开放好政策，急师生所急、想师生所想，不断健全办学机制，延请人才，突出学科综合和特色发展，在学校管理、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师资建设、社会服务等方面作出了贡献，让学校焕发勃勃生机，80年代成为校史上最为辉煌的历史时期之一。特别是他带领师生团结一心，在联合办学方面走在了全国高校的前列。他强调西北大学必须继续采取开放改革的

总方针，“一定要面向全省、全国和全世界。要有计划地走出去，和国外大学、和国内企业挂钩，要有在世界范围为西大争荣誉的雄心壮志。”我们要聚焦既定目标，以更大魄力、更强使命推进办学治校改革，扎实推进“双一流”建设，凝心聚力、追赶超越，实现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沧桑易使乾坤老，风月难消今古愁。惟有多情是春草，年年新绿满芳洲。”张岂之先生十分喜欢清代诗人张维屏的这首诗。他从不以大树自居，不愿意接受超过实际的称誉，而是愿意把自己看作一株普通的春草。春草不以高大示人，却能在严冬之后重新生长；春草不争一时声名，却能年年新绿，遍布大地。

如今虽然哲人枯萎，音容遽渺，但他播下的春草已经在后继青我心中生根成长。

出现在他的课堂周围。一天下课后，张岂之问侯外庐先生：“我的课怎么样？能不能打60分？”侯先生微笑着回答：“不止60分。你上课，可以打80分，但是距离90分还有一定的距离。”隔着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张岂之略显羞涩的脸上仍然带着隐隐的得意。

在北大求学时，张岂之曾选读任继愈先生的《隋唐佛学》。任先生在讲课中着力引导学生从史料中抽绎出观点，这种重视理论分析的治学方法，让张岂之感到每听一次课都有所收获。尤其令他难忘的，是他向先生请教是否可以着手阅读关于中国佛教的书籍时，任先生却劝他暂缓，建议他先读先秦诸子书，有了这个基础，才便于研究其他。张岂之依言开始读先秦诸子，写了不少读书笔记，大多得到了任先生的批注。“在我的记忆中，教我的老师们在课堂内外都是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的先生。”

从老师那里受到教益的张岂之，自己成为一名教师后，也“总想着一点：既然是教师，做的一切就一定要对学生有用”。

“几十年来，在大学，不论在西大，还是后来改革开放新时期在清华，我没有不讲课的。”即使在担任西北大学校长的日子里，张岂之也坚持开课；卸任之后，又欣然接受清华大学聘请，成为两所高等学府的双聘教授。他喜欢讲课，他的课也广受学生欢迎。西北大学中文系1977级校友沈宁，多年后生动回忆起张岂之教授给他们班讲授《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情景：“上讲台，不看讲义，引经据典，一口气地讲，不重复，一写一黑板，写满了，擦掉再写。我们学生赶不及地抄黑板记笔记，生怕漏掉一个字。”沈宁后来带着厚厚的一大本笔记赴美求学，在美国的大学里读研、做助教，“一个历史教授生病，要我代几节课，临时抱佛脚，就拿出张岂之教授的课堂笔记，照本宣科，应付下来。”

张岂之1978年任副教授，1980年任教授，1984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1984年，中国思想史获得专门史(中国思想史)博士学位授予权。多年来，张岂之带领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团队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和博士后500余名，均已成为思想文化研究与教育领域的骨干力量。

(下转二版)



华夏文脉的守望者

□ 熊晓芬

（上接一版）

张先生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希望学生得到规范而严格的学术训练,在文字训诂、历史文献、逻辑、外语等方面都能打下牢固的基础。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谢阳举教授每次呈送文章给张先生审阅,都既喜且“忧”。喜的是,每次稿件都会被仔细审改、大有提升;忧的是,“不知要改多少次才可以在先生那里‘过关’”。今天的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教授肖永明曾跟随张岂之先生学习中国思想史:“张先生强调思想史的学习研究必须关注思想与社会的互动,要求我们在思想史学习研究中既要精读基础文献,搜采稀见文献,同时要关注新出文献。”张岂之要求学生力戒凭空议论、过度引申和发挥,强调只有在史料基础上进行归纳分析,才能得出切实可靠的结论。这些看似平常的指导,从一开始就帮助学生树立笃实严谨的学风、为未来的学术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除了面对面授业解惑,张岂之还非常喜欢通过提笔写信与教师学生们交流。1993年9月9日,新入学的博士生、今天的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张茂泽收到了导师张岂之先生的第一封信:“请你们读侯外庐先生《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这两本书体现两种研究方法,都是科学的,不可扬一压一。”不久后,张茂泽就如何提高逻辑思维水平向老师请教,张岂之迅速回信,提点他“不在于读逻辑教科书,要靠平时有意识的积累”,并专门开列了书单。

2007年,学生们辑录出版了《张岂之教授与研究生论学书信选》。在首发仪式上,有学生感慨地说:“30多年来,我没有随波逐流,没有妄求幸福,能基本保持本分,保持人格独立,得益于先生对我的思维训练。”

因为重视教学,张岂之格外重视教材建设。多年来,从编制提纲到具体编写,从审改稿件到开会商讨,张岂之亲力亲为。翻开历次由他审阅的书稿,密密麻麻的修改与批注随处可见。他经常呼吁高校教师关注教材的编写,因为“一本好的教材可以影响学生一生”。由他主编的《中国历史》《中国思想史》分别获得国家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

“我对西北大学很有感情”

1978年,张岂之任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1983年任西北大学副校长,1985年任西北大学校长。短短几年时间,他从一名高等院校专任教师,成为了一所历史悠久的全国重点综合大学的校长。党的改革开放好政策,为他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大好时机和平台。

1985年11月23日,张岂之给校长办公室写了一封长信,要求校办要重视师生来信:“烦请校办阅处者,都要登记,并说明如何处理的,以备日后检查。……有些信是学校对部门的批评和建议,校办有责任将它们转告给某些单位,督促他们改进工作。……学校是教育场所,是人才集中的地

方,因此学校绝对不能允许‘官气’。学校各方面的负责人都应毫无例外地加强‘服务’的观念。”任校长期间,张岂之经常深入教工和学生中间和他们谈心、交流思想,鼓励他们给学校工作多提意见和建议,还会时不时提笔给师生写回信,开导思想、解决问题。很多师生在接到回信时的第一句话都是:“收到您的回信,真没有想到……”

“时代和社会需要一批知识分子走上领导岗位,为更多的人创造条件,使他们更好地发挥才能,这种贡献并不亚于学术上的贡献。”在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研究方面有很深造诣的张岂之,作为一所高校的管理者,不仅能够急师生所急,想师生所想,切实解决师生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更在深刻地思考着如何让一所高校焕发勃勃生机。在他主政西北大学期间,锐意改革,推行学校管理规范、科学化、人文化的构想,延请人才,突出学科综合和特色发展,在学校管理、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师资建设、社会服务等方面作出了贡献。特别是他带领西大师生团结一心,在联合办学方面走在了全国高校的前列。

1984年,西北大学分别与中国石化总公司、石油部达成了办学协议,学校的办学规模增加了2000人,并推动了多层次、多种形式的办学;

1985年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立,在原有的4个本科专业基础上,增加了计划、基建、经济管理、会计、旅游经济等5个专修科;

1986年,西北大学与宁夏银南地区签署了科学技术合作和委托代培人员协议;

1987年,西北大学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签订了教学、科研和人员交流的协议,在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西北地区开辟了用武之地;

1988年9月21日,西大中原油田分部开学。西北大学的教师走出校门,利用大企业的设备和优越的条件,兴办了石油地质、石油化工、油田化学等3个专业;

1990年,西北大学同陕西省文物局签订协议成立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在原有的历史、考古、档案等3个专业的基础上,增设博物馆学和文物保护工程学两个专业。

……

从1980年到1989年,西北大学先后与国家医药总局、国家旅游局、石油部、中国石化总公司、国家计委、中国建设银行等20多个部门和单位达成了联合办学、接受委托办学的协议。10年联合办学,使学校冲出计划经济的束缚,促进了老专业的改造和新专业的建设,学校的各项设施都有了较大的改善,办学规模和层次都有了极大的发展和提高。到1991年,全校的系(院)、专业设置由1983

年的13个系、26个专业发展到3个院、17个系、41个专业(本科专业35个、专科专业6个),学校真正发展成为一所文、理、工、管、法学科门类齐全的重点综合大学,在校各类学生总数近7000人,比10年前在校学生数翻了一番。这所西北地区成立最早的学府朝气蓬勃,走出了一条在现行体制下挖掘潜力、促进高校改革发展的新路子。

1988年,西北大学被原国家教委列为全国6所综合改革试点院校之一,1989年被评为陕西省改革试点单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新闻媒体都作了详尽的报道。20世纪80年代,成为西北大学史上最为辉煌的历史时期之一。

1989年,张岂之在学校校报发表《元旦感言》,他深情地写道:“西大必须继续采取开放改革的总方针。要开放改革,就要自觉地去掉影响深远的小农经济思想,起码要逐步做到使这种思想不要过多地影响教育的发展,西大一定要面向全省、全国和全世界。要有计划地走出去,和国外大学、国内企业挂钩,要有在世界范围为西大争荣誉的雄心壮志。”

“人文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

2017年5月18日,在西北大学“侯外庐学术讲座”第100讲上,场内场外挤满了求知若渴的听众。坐着、站着甚至蹲着的师生们凝神静气地聆听着讲台上张岂之先生侃侃而谈:“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读本》,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归纳为天人之际、道法自然、居安思危、自强不息、诚实守信、厚德载物、以民为本、仁者爱人、尊师重道、和而不同、日新月异、天下大同……”

12个核心理念概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张岂之看来,其中每一个理念,都浓缩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智慧源流。

1991年,张岂之从西北大学校长的岗位上离任,同年起任西北大学名誉校长。1994年,张岂之受聘为清华大学双聘教授。他开始将比较多的精力和时间集中在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和素质教育(含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等研究上,在学术研究和文化普及方面不懈努力。作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开拓者和先行者,张岂之独著或主编《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历史十五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读本》《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等,在学术研究与通识教育教学中提炼出中华人文精神七大精髓,系统概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十二个核心理念,为理解中华文明精神内核、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了完整理论框架。

张岂之常说,一个教授,不仅仅是“搞研究的学问家”,也应该是“讲课的学问家”。在耄耋之年,他一面著书立说,一面依旧活跃在教学一线,开设公开课和系列讲座,面向本科生、青年教师常态化讲学。

作为中国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发起者和推动者,张岂之对中国高校人文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早在20世纪80年代,张岂之及其教学科研团队就较早研究和认识到文化的教育价值,并萌生出文化育人的大学理念。在他主政期间,西北大学是全国最早在研究生层次,不分文理科开设必修课“中国传统文化”的院校。在教育理论和实践中,张岂之根据教材严重滞后的现状,组织编写系列文化育人教材。经过多年的努力和积累,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材体系,即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中国思想精华与经典为主干,兼融和吸收世界优秀思想文明成果。

张岂之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道法自然”“以民为本”“大同”等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而且是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以“人”为主体的文化,这决定了其必然蕴含着丰富的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他倡导通过文化将教育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结合起来,通过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学生的思维水准,熏陶道德人格,树立健康的文化观和价值观,成为有文化品位和内涵的优秀人才,以实现人的价值和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

在第二届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开幕之际,张岂之先生分享了自己对大学精神的理解:民族蒙难,教育救国;科学精神,人文依托;文化传承,新知创造;大学昌盛,国家富强。他指出,中国高等教育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紧密联系,这不是任何人的意志使然,而是历史形成的;这不是“缺失”,更不是“先天不足”,而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教育资源和精神财富。“大学昌盛”是指“人民满意的大学生”“高质量的大学生”“培养出全面发展优秀人才的高等教育”,而高质量大学教育和我们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密切相关。西北联大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将高等教育制度系统地传入西北,奠定了西北高等教育的基础。2012年,张岂之先生牵头发起“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为赓续中国大学精神、传承西部教育文脉作出了独特贡献。

2020年12月,在“纪念张载诞辰10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94岁高龄的张岂之先生声调铿锵,朗声吟诵“横渠四句”。当吟至“为万世开太平”一句,先生举起右手用力向上挥出,会场上掌声四起,与会者无不动容。

曾有学生问张岂之先生:“如果要给先生一个称号,先生愿意接受什么样的称号呢?”张岂之不做思索地说:“如果你们认可,我愿意做一位人文学人。”

张岂之先生曾将人文科学比作春草,因为他喜欢清代诗人张维屏的诗句:“沧桑易使乾坤老,风月难消今古愁。惟有多情是春草,年年新绿满芳洲。”虽不是参天大树,但柔韧坚强的春草却使世界充满生机。张岂之先生在人文科学,特别是在中国思想史研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也将长长久久地丰富我们的精神,滋养我们的心灵。



张岂之先生主讲“侯外庐学术讲座”第一百讲

唁电摘录

张岂之先生逝世后,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有关国家机关,教育界、文化界、学生、亲友、家乡等纷纷发来唁电唁函,表达沉痛哀悼、由衷敬仰,以下是其中的部分摘登。

一

获悉张岂之先生辞世,感到震惊和悲痛。先生是德高望重的学者与教育家,为教育与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大家铭记于心。我在国际儒联任会长时与先生多有合作,先生对国际儒学事业亦贡献良多,深为感怀。谨致深切哀悼,向家属致以问候,望节哀顺变! 请代送花圈。

国务院原副总理、国际儒联副会长 刘延东

二

西北大学张岂之先生治丧工作组并张岂之先生亲属:

惊悉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张岂之先生不幸逝世,清华大学全体师生员工深感悲痛,不胜哀悼。

张岂之先生是我国思想文化界的泰斗,侯外庐学派的杰出传承者与开拓者。他一生致力于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著述宏富,影响深远。他担任中宣部、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史学概论》《中国思想史》首席专家,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了开拓性贡献。主编的《中国历史》《中国思想史》分别获得国家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

张岂之先生与清华大学渊源深厚。1950年他考入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攻读研究生,在清华园度过了重要的求学岁月。自1994年起,张岂之先生受聘为清华大学双聘教授,对学校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倾注了大量心血,以其深厚的学养和崇高的人格魅力,影响和激励了无数清华学子。

张岂之先生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他甘为人梯,奖掖后学,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他提炼中华人文精神精髓,系统概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先行者。

张岂之先生的逝世,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和高等教育界的重大损失,也使清华大学失去了一位令人敬仰的杰出校友和德高望重的师长。先生虽已远行,但其学术思想与精神风范将永励后学,长存世间。

谨以至诚唁唁,深表哀悼,并向张岂之先生的亲属致以诚挚的慰问,万望节哀珍重。

清华大学

三

西北大学张岂之先生治丧工作组:

惊悉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哲学家、教育家张岂之先生遽归道山,本社同仁震悼殊

深,悲恸难名。

张岂之先生一生秉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深耕中国历史与思想史研究,毕生致力于“侯外庐学派”学术理路的赓续与弘扬,于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及高等教育诸领域建树卓著,声播海内,望重士林。先生之殒,诚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之巨擘倾颓,梁木其坏,损失何副!

长期以来,张岂之先生对本社工作关怀备至,鼎力襄助,于杂志志事业发展多所垂注,贡献良多。今哲人其萎,音容遽渺,然先生之道德文章、治学风范,必将垂范后世,长存于我辈心中。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谨致沉痛哀悼,并恳请治丧委员会代为转达对先生家属的诚挚慰问。惟愿节哀顺变,善自珍摄。张岂之先生千古!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四

西北大学张岂之先生治丧工作组并转张岂之先生亲属:

惊悉张岂之先生逝世,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全体同仁深表哀悼!并向张岂之先生亲属表示深切的慰问!

张岂之先生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侯外庐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为侯外庐学派的传承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先生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不懈耕耘,著述宏富,影响深远。先生执教杏坛数十载,以渊博学识与谦和风范化育菁莪,甘为人梯,行为世范。

先生与我所渊源深厚,在我所建立之初就曾借调在所内中国思想史组,协助侯外庐先生工作,为《中国思想通史》的撰著与中国思想史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后仍长期支持和关心我所工作,对所内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多方面给予指导和帮助,使我所深受其益。张岂之先生的逝世,是学界的重大损失,也使我们在思想史研究上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

张岂之先生千古!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心

五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惊悉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张岂之先生辞世,中国哲学史学会全体同仁谨表深切哀悼,向家属致以诚挚慰问。

张岂之先生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后受聘于侯外庐先生,在西北大学任教七十余载。先生是侯外庐学派的代表人物,毕生致力于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研究,协助整理《中国思想通史》,共同主编《宋明理学史》,在推动中国思想史研究方面成绩斐然。先生著述宏富,独著、主编各类著作二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先生历任西北大

学校长、荣誉校长,桃李春风,化育英才,培养硕博硕士研究生及博士后五百余名,是德高望重的教育家,为西北地区的人才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岂之先生曾任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常务理事,是中国哲学界敬仰的前辈。先生的逝世,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和高等教育界的重大损失。先生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学术精神与人格风范将永励后学。

中国哲学史学会

六

张岂之先生治丧委员会:

惊悉张岂之先生仙逝,外研社全体同仁万分悲痛,谨致以最沉痛的哀悼。

张岂之先生是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承继侯外庐先生的学术道统,以七十余载的治学与育人,为中国思想史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倾注了毕生心血。先生学贯古今,著作等身,主编《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学说史》等巨著,提炼中华人文精神精髓与传统文化核心理念,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了开拓性贡献。

张岂之先生是外研社敬重的良师益友。作为“中国思想文化语传播工程”的顾问,先生自工程成立之初即鼎力支持,以其深厚的学术造诣为术语的整理、诠释与传播把关定向。先生曾为《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中英对照)》撰写推荐意见,高度肯定该项工作的创新性 with 基础性,并欣然推荐该书参评中国出版政府奖,对术语工程的推进和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给予了莫大的鼓舞与帮助。张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十五讲》《中国传统文化》两部重要作品亦由我社输出阿尔巴尼亚,为阿尔巴尼亚民众认知、理解中华历史文脉与文化底蕴筑牢坚实根基。

张岂之先生的逝世,是我国学术界、教育界和文化传播事业的重大损失。外研社全体同仁将铭记先生的教诲与支持,继承先生遗志,继续做好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整理与传播工作,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不懈努力。

谨向先生的家属致以最诚挚的慰问,恳请节哀珍重。

张岂之先生千古!

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七

西北大学张岂之先生治丧工作组:

惊悉母校名誉校长张岂之先生遽归道山,北京四千多名校友万分震惊,悲不能已。谨致以最深切哀悼,并向母校及岂之先生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务祈节哀顺变。

岂之先生是我国西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大学校长之一,也是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的教育名家和史学大家。岂之先生1926年生于江苏南通,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50

年进入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深造。1952年应侯外庐先生之邀,扎根西北大学,自此将其毕生心血尽付西北大学高等教育事业,其德业风范,令人永怀景仰。

岂之先生与西北大学“京源”渊源尤为深厚。童年时因抗战随母亲转移至陕西城固,就读于西迁至此的北平师范大学附中。西北大学“京源”溯自北平大学及西北联大,岂之先生一生珍视这段校史,倡导校友不忘“京源”传统。岂之先生承继侯外庐学派,深耕中国思想史研究七十五载,主编《中国历史》《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史》等巨著,为中华文脉传承立下不朽功勋,堪为后世学人楷模。

作为西北大学校长与名誉校长,岂之先生视野开阔、守正创新,主导综合改革,为学校发展作出突出贡献。岂之先生深耕学科建设,重塑人文社科新格局,使西北大学成为全国文史研究重镇。岂之先生更是中国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先行者,指出大学若无人文浸润便干枯贫乏,倡导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岂之先生推动西北大学成为全国最早在研究生层次为文理科开设“中国传统文化”必修课的院校,从校长到名誉校长,以毕生精力铸就西北大学学术根基。岂之先生的远见卓识和教育情怀,令校友们无限敬仰。

作为西北大学出版社首任社长,岂之先生在建社之初兼任第一任社长,带领出版社“创业者”筚路蓝缕,立足本校实际、精心策划选题,出版大批高质量学术著作。岂之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史》1989年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是新中国四十年来首部国家教委审定高校统编教材。八秩晋七,亲为《关学文库》逐篇审订;九秩高龄,伏案九月修订《宋明理学史》,终成“西北大学名师大家学术文库”的重镇。岂之先生以耄耋始背之年,犹躬耕不辍,一丝不苟,此等生命不息、治学不止的精神,感人肺腑,永激后学。

作为西北大学北京校友会发起人及名誉会长,岂之先生履新西北大学校长后,第一件事是1985年在北京发起成立校友会。岂之先生视校友为大学重要组成部分,支持成立“京源校史研究所”并担任名誉顾问,努力维系校友“京源”意识。年事已高后仍以视频问候校友,那慈祥笑容和温暖话语已成为北京校友心中最珍贵记忆。在北京校友心目中,岂之先生永远是一位可亲可敬的“仁者”,思之令人潜然。

岂之先生立功立德立言,皆树丰碑。今虽驾鹤仙去,而风范长存,教诲永被。北京校友椎心泣血,沉痛悼念,并将永远深切缅怀我们无比敬爱的张岂之校长! 岂之先生千古!

西北大学北京校友会

八

张岂之先生治丧委员会并转家属:

惊悉张岂之先生不幸遽然长逝,噩耗传来,万分悲痛!我谨以个人名义,向先生的离世表示最沉痛的哀悼,并向家属致以最深切的慰问!

张岂之先生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侯外庐学派的主要传承者与创新者。先生毕生深耕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研究与文化素质教育事业,将全部心血倾注于教学与研究之中,培育桃李遍布天下。先生道德文章,学人风骨,堪称一代师表。

回想我在西北大学学习和工作期间,先生作为校长的治校风范与人文情怀,以及对“公诚勤朴”校训精神的言传身教,始终是我辈学子为人学子的精神坐标。先生的学术思想与教育精神,将永远为后人所敬仰传承。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张岂之先生千古!

中国科学院院士 刘买利

九

恩师百岁,赫然驾鹤西归,闻之凄然。忆及往事,音容笑貌,言犹在耳。联云:

有教无类,百年躬耕续绝学;守正日新,理路一脉,春草年年绿华夏;

体道安人,之死无靡堕斯文;长安夜雨,清华旧事,人文耿耿映千秋。

武汉大学二级教授 麻天祥

十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并西北大学张岂之先生治丧工作组:

惊悉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恩师张岂之先生因病於二零二六年七月十九日十七时二十四分在西安逝世。他的逝世,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和高等教育界的重大损失,也使我们失去了一位淳谨善诱、和蔼可亲,随时可以请益同学的大先生。噩耗传来,我们不胜悲痛,谨此对先生的不幸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希望先生家人节哀顺变,保重身体!

我们是西北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七九级同学,入校时先生正担任历史系主任。入校启蒙,学业递进,请益学问,聆听教诲,先生都是蔼蔼长者。在校四年,先生的学人气象、儒雅风范和勉心提携,至今历历在目、点滴在心。得益于先生和母校的精心培养,我们顺利完成了学业,奔赴祖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条战线,数十年来不懈努力,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各自的贡献。饮水思源,慎终追远,我们怎能不感念先生的大爱和栽培!

先生作为侯外庐思想史学派的核心传承者和创新者,他的中国思想学说教育、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教育,他的家国情怀、命世态度,他的参与意识、贡献精神,他倡导的兼和、守正、日新的观念,他强调的会通、切用、明白的学风,居功至伟,泽被寰中;他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先生之风,高山仰止;先生之德,日月同辉。哲人其萎,师范永存;思想裔脉,源远流长!

张岂之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西北大学历史系七九级全体同学敬挽

怀念恩师张岂之先生

□ 方光华

后天，我们就要送别中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我们敬爱的恩师——张岂之先生。

先生百年人生历程是一位人文学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壮丽诗篇。

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思想史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便追随侯外庐先生，投身于《中国思想通史》的编撰工作，协助侯先生完成了这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奠基之作。后来又通过共同撰写《中国近代哲学史》《宋明理学史》等著述，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思想史领域的探索。先生治学，讲究“守正”“兼和”“日新”。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立场，强调思想史的研究必须关注思想与社会的互动，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但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当代的发展始终保持“和而不同”的胸怀。他主持的六卷本《中国思想学说史》比较充分地吸纳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反映出

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批判到建设转化的思考。

先生不仅是思想史家，更是教育家。在七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始终坚守在讲台一线，即便在担任西北大学校长期间，也从未中断过给本科生和研究生产课。90多岁高龄，还坚持给研究生上新学期第一课。他对学生的爱，深沉而又严格。我们这些弟子，每个人都收到过先生的亲笔书信。2007年辑录出版的《张岂之教授与研究生论学书信选》，字里行间流淌着一位师者对学生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盼。

先生晚年思考最多的是，如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他是当代中国教育理论—文化素质教育理论的重要创立者和推动者。他常说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来自我们深厚的文化底蕴。他晚年精心撰写的《中华人文精神》，将中华人文精神凝练为六大精髓：文明之初的创造精神、穷本探原

的辩证精神、天人关系的探索精神、人格养成的道德精神、博采众家之长的文化会通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精神。他指出，这些核心理念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基因，也是解决当代人类面临难题的智慧源泉。先生非常重视教材的编著，他主持编写的《中国思想史》《中国历史》《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历史十五讲》《中国思想文化史》都深受大学生和社会的欢迎。当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历史十五讲》《中华人文精神》各种外文版出版，他为中华文化受到海外读者欢迎而倍感欣慰。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期，先生担任陕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20余年，他推动了黄帝与黄帝陵、老子与道家文化、法门寺与佛教文化、张载与关学的研究，陕西思想文化界的诸多重大学术工程，都由他发起和引领。在他人格魅力的影响下和身体力行的感召下，陕西人文社会科学硕果累累。先生还长期担任中国史学会、国际儒

学联合会、中国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的领导职务，为建设中国气象的人文学术奔走呼号。

先生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是教书育人的一生，是为中华文化赓续文脉的一生。道继中华血脉，学传华夏人文。先生的学术风范与人格魅力，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

我1987年到西北大学跟随先生念研究生，一转眼40年就过去了。回顾走过的人生历程，在我重要的人生节点，都有先生的指点。如果没有遇到先生，我都不知道我的人生会是一种什么样子。40年来，我没有随波逐流，没有妄求非福，能保持本分，保持人格独立，得益于先生对我的鞭策教诲。

我只是先生无数及门弟子中的一个。在我这样的学生身上，到处都有先生的烙印。先生将离我们远去，但先生在我们心中播下的种子，每天都在生长，不论它们将来会生长成一棵大树，还是一叶小草，它们都会满怀对先生的感恩，茁壮成长。我们将带着先生的嘱托，守正创新，砥砺前行，为繁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全部的力量。

（注：作者系张岂之先生学生）

19日晚上，听到张先生逝世的噩耗，一幕幕往事像潮水般翻涌，悲恸之情，久久难以平复。

1995年，我有幸投入先生门下。三十年来，从求学长安到执教长沙，从为学修业到立身处世，每一步都得益于先生的耳提面命，每一程都感受到先生的精神指引。先生即便近年卧病在床，仍然嘱托我们：不能只关注学术研究，要给学生开设传统文化通识课程。今年4月2日我和范立舟师兄探视先生，曾相约今年秋天再赴西安为先生祝寿。不料那次相见，竟成永诀。这份哀痛，难以言表。

张先生是我们心中真正的“大先生”。他常教导我们，做人要正，做学问也要正，要把做人和做学问统一起来。先生一生，贯通古今，在思想史和史学领域成就斐然，特别是侯外庐学派发扬光大，卓然成家。但他从不以“大师”自居，总是把教书育人、奖掖后学作为自己的使命。面对学生，永远是那样的平和耐心。是他牵着我们手，引领我们走入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神圣殿堂。

在课堂讲授与研讨交流中，先生总是跟我们强调，思想史研究必须关注思想与社会的互动，要求我们注意史料的搜集梳理，加强理论思维训练，具备兼收并蓄的学术视野。

先生还用一种特别的方式陪伴着我们的成长——写信。几十年来，几百封信，谈读书、谈学问、谈做人。每一次收到先生的信，展开研读，字字句句都

张先生是我们心中真正的『大先生』

□ 肖永明

是关切与点拨。他是在用笔、用时间、用整颗心，一点一滴地教我们如何读书，如何思考，如何立身，每一封信都是先生心血的见证。

先生常说：“作为一名教师，要把自己的‘心’投进去，才能把课讲好！”这也是他一生教学实践的总结。先生毕生没有离开讲台，即使到九旬高龄也乐此不疲。在记忆中，讲台上的先生虽已满头银发，但依旧身姿挺拔、音调铿锵、思路清晰、妙语连珠，深受学生爱戴。

以前参加学术会议，我最爱听先生的总结。他总是精神矍铄，高屋建筑，将纷繁的发言梳理得井井有条，瞬间拔高了研讨的立意。那矍铄的身影，铿锵的语调，是先生晚年留给我们最鲜活的记忆。我们总觉得先生不会老，那铿锵的声音会一直讲下去。

可是今天，先生还是离开了我们。我们失去了一位学术严师，一位人生引路人。但先生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有厚重的著作，更有做人的正直与谦和，有做学问的严谨与真诚，有对中国文化的深情与担当。

先生曾经为思想所亲拟“兼和、守正、日新”六字所训。作为先生弟子，我们定当铭记教诲，在各自的岗位上，传承先生之学，继先生之德，沿着“兼和、守正、日新”之路坚定前行，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注：作者系张岂之先生学生，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院长）

春草长青 师恩永存

□ 王维坤

对我而言，张先生不仅是我的恩师，也是发现我、培养我、帮助我走上中日文化交流与东亚考古研究道路的伯乐。

二十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国内学术界逐步恢复与国外的交流。当时，能够使用外语直接阅读国外专业资料，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教师还不多。张先生担任西北大学校长期间，明确提出：“我们要培训我们自己的外语人才。”在先生的倡导和支持下，西北大学开设了教师英语培训班和教师日语培训班。我也参加了教师日语培训。

我还清楚地记得，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天傍晚，张先生特意来到西北大学教职工宿舍“半边楼”二楼宿舍找我。先生告诉我，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吉川忠夫先生即将来西安访问，希望由我负责接待，并陪同吉川先生参观文物古迹。张先生郑重地对我说：“你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学习日语，西北大学要培养自己高水平的外语人才。”

在陪同吉川忠夫先生参观考察的五十三天中，我一面承担接待和文物讲解工作，一面利用与吉川先生朝夕相处的机会学习日语。在吉川先生离开西安前一天举行的送别活动中，他亲切地对我说：“小王，我觉得你的专业基础打得很扎实，请你抓紧学好日语，以后有机会我请你赴京都大学留学。”张先生和吉川先生的两句话，成为我学习日语的最大动力。第二天，我便前往西安大街新华书店，购买了一套上、中、下三册的《日本语》教材。

当时，西北大学虽然已经与京都大学建立了友好关系，但两校之间尚未建立人员互换交流协议。1986年3月22日，我前往日本同志社大学留学，师从日本考古学家森浩一先生，开始系统学习日本考古学，并进一步开展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和东亚考古研究。

我赴日本学习以后，先生仍然关心我的研究和成长。回国后，我继续从事古代中日文化交流、丝绸之路考古和东

葫芦头羊肉泡馍什么的，他说不必请了，陪我在城里转转。我们俩从西大走到西安城的西门，坐电力公交车去东大街闲转，倒是他自己掏钱，我们一起在东大街吃了一碗汤面。吃饭的时候，他说你们年轻人要注意身体，不珍惜身体将来会吃亏的。分别之后，我读他送我的书，也买过他的书看，还曾经给他写过信，他也及时回，回信仍用毛笔写。后来就慢慢地就断了，联系的很少……

偶尔，在三秦大讲堂，也聆听过先生的讲座，周围都是大人物，也不便贸然前往叙旧。2011年前后，学校要邀请张先生来学校作报告，我主动向惠洪河书记请缨，自告奋勇地和团委书记钟宇宏一同前往西大去请先生。这时候，先生的家搬在了桃园校区，那是有电梯的高层楼房。当我敲开门，张老师凝视着我，说你是不是我的学生？我赶紧说是，他说

岂弟君子 温润如玉

□ 翟奎凤

仁者静，仁者寿！张先生百岁高龄正印证了孔夫子这句话。像张先生那一辈学者，我生也晚，接触的不多。我与张先生有交往，也有交情，现在想起来非常温暖，非常荣幸，也特别感激！

我2010年—2012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做的博士后，应该是在清华的相关学术活动上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了张先生。我去他住在清华园西南楼的家拜访过他，也去过他们家，谈的啥记不清了，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张先生送我下楼，说去附近修水壶，我陪他过去。我当时想，这么大教授，还做过西北大学校长，水壶坏了还修啊，直接买个新的就是了。可见，老先生非常简朴节约。在清华校园里，张先生过马路特别小心，步履很轻很慢，走得又很实，他还拉着我提醒让汽车、自行车先过，别抢道。现在想起来这个细节特别温暖，所以我记得也特别深刻，有点像爷爷带着孙子过马路的样子。张先生说话，慢条斯理，非常平静缓和，面带微笑，很温暖。记得他跟修理铺师傅说话也同样很温和。还有一次，碰到张先生，他说要去北京南站出差，当时张先生也85岁高龄了，他好像要坐地铁四号线过去。当时张先生身体还健朗，但毕竟85岁的老人了，心里想没人陪着多不放心啊，我一热心执意送张先生去南站。路上的具体印象、一路上聊的啥现在也都模糊了。

张先生非常实在地帮过我一次忙，就是给我推荐《西北大学学报》发了一篇文章。我当时只是博士后，也不是他的亲学生，也不知那时是怎么厚着脸皮向张先生开得了口，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张先生爽快答应了，说推荐试试。后来顺利发表了，文章题目是《从孔子论“生无所息”看儒家的生死哲学》。多年之后，我也了解到这篇文章其实也是走了外审程序的，其中外审之一是北师大的一位著名前辈。

后来张先生年事已高，长期在西安定居。大概是2019年4月，西北大学承办了“清明祭黄帝陵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术论坛，张先生还作了关于“会通”的主题演

讲。会间休息的时候，张先生一眼认出了我，还记得我的名字，特别关心我工作生活情况。当时张先生已经92岁高龄，记忆还这么清晰，会上那么多著名学者，我只是很普通的年轻后辈，这让我非常感动！

张先生生于民国，百年风雨，岁月洗礼，经历过那么多重大历史转折，特别是民族危难、惨烈的抗日战争时期。我见到过的张先生是他的晚年，可谓饱经风霜，淬炼成金，洗尽铅华，温润如玉，是经历了各种复杂性之后的人性单纯与高贵，如奔腾不息的河流在汇入大海前非常平缓静谧，波光中浮漾着金色的夕阳，这是张先生晚年给我的印象，是一种带着暖色的返璞归真，也流露着几分童趣。张先生跟我说过他教过的一些后来成就很高的学生，包括如何给他们写推荐信找工作，一些细节我现在还记得。张先生没有城府，记得他还跟我谈论过跟他同辈的一些学人，非常直率。能与这样一位伟大的百岁老人有过交集，而且得到过他的关照关心，现在想起来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张先生著作等身，他是侯外庐学派最为重要的传人，他的系列思想史、学术史著作影响广泛。张先生重视孔子所说“仁者爱人”“和而不同”，重视老子所说“道法自然”，我想“仁和”与“自然”正是张先生晚年人格精神的写照。

张先生于我更多是人格上的感染与感召，我见到他已经是他85岁之后的晚年了，能与张先生近距离接触非常荣幸！张先生清瘦温润，纯粹平和，记忆力特别好，说明他内心很静。张先生一点架子没有，对晚辈，像我这样都是他孙子辈的年轻学者，他还能特别记起，关心我的工作生活细节，并愿意给予力所能及的关照帮助，这些都特别让人感动。这是我直观感受到的张先生立德的一面。张先生德高望重，社会地位高，但跟张先生聊天很放松很亲切，一点不拘谨。虽然老先生跟我说的是什么大都不记得了，但是他温润如玉的君子人格形象永远高高矗立在我内心深处！我想这就是不朽的意义！

（注：作者系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原文有删减）

怀念张岂之先生

□ 程永清

我与张先生结缘于1991年的那个冬天。当时陕西省教育厅在西安外国语学院开展职称评审工作，借调我去教育厅职改办做联络员，正好服务于张先生任组长的历史地理组。

1991年的职称评审工作是时断时续中断了三年才恢复常态化评审的第一年，对教授标准的俗称是“上过三门课，年均160学时，发表五篇论文，写过一本书。”当时杂志很少，刊物不多，能呈报到省教育厅都是有指标的，不存在竞争关系。但当时各组掌握标准不一样，淘汰率还是比较高的。记得西安以外某高校有个老师写了一本小书叫《科举制度史》，大家讨论的时候争论不休，我以为这个老师肯定评不上，张老师最后说，“当下出现一种现象，叫不入史门，跳出史坑。这个老师潜心史学教育十多年，且在外地，条件也都达到了，我们对青年教师还是要包容的。”这个老师就很羡慕地评上了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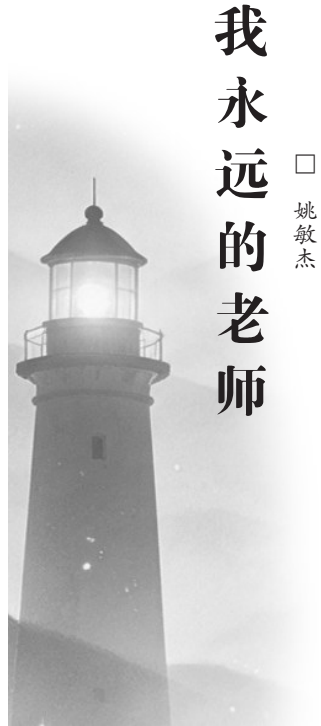
后来我才知道，张先生是刚从西北大学校长岗位上退下来的大学者——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他在北大上的本科，清华上的研究生，他的老师是马克思主义

史学奠基人侯外庐先生，还有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大哲学家张岱年先生以及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季羡林先生。名师出高徒，张先生在中国历史、中国思想史和文化教育领域的原创性贡献有目共睹。

后来的某一天，张先生来电电话让我第二天到思想所来。翌日一大早，我骑上刚买的自行车就去西北大学，在西大西门口就看见张先生站在校门口等我，让我很不好意思。张老师很谦和，带我在西大校园散步，领我去思想所参观，问我学习工作情况，还谈到他正在整理资料要给郭琦校长搞个纪念会，送了一本书叫《思念中的郭琦校长》。

1994年，张老师创刊的《华夏文化》公开发行，虽然不尽张老师的意，他还是在人民大厦隆重地举办盛大的创刊座谈会。邀请函是张老师亲自用毛笔写的，收到后我很激动，那天坐学校派的车风光地去了人民大厦。参会的人很多名声在外，我一看这阵仗，惶惶不安，迟迟不敢落座，要求给与会人员端茶倒水做些服务。张老师让我坐在他的旁边，说你是我请来的，还要做杂志方面的工作呢。

再后来，张老师说他被清华大学聘任去北京工作。临别前，我说要请张老师吃顿饭，



□ 姚敬杰

我永远的老师

别的师友那里得到了印证。若干年以后，我和毕业于西大历史系七九级、多年供职于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也已经退休的张世民学长说起此话题，他深有感触地说：“有一次，我在谈话间，称清华大学某位教师为先生，他历声说，称老师，不要称先生”。即此可见，先生非常看重在他心目中“老师”这个排名第一的身份定位。

因了这师生关系，先生待我便格外随意。他知道我有时住在办公楼值班室，夜里便会打电话唤我上二楼办公室谈话甚至聊天。有时他因次日有活动要讲话，为保证思维连贯，便让我坐在一旁，将他即兴演说的话语逐字记录下来，再一同打磨润色。那些夜晚，办公室里只亮着一盏台灯，先生的侧影映在墙上，声音如溪流般缓缓淌出，我便像个学徒，一笔一笔地记下那些思想的碎片。

1991年，先生因年龄原因卸任校长，希望我随他去思想文化研究所工作。他连我的职业规划都想得周全了。尽管后来因年轻气盛等诸多缘由，我未能坚持在研究所走下去，但不可否认，那六年的光阴，我从先生身上学到的东西，远比书本上的要多得多。他教我做事要扎实，做人要诚恳，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这些话，在当时听来是道理，如今想来，却是他一生的注脚。

1994年，先生成为清华大学的“双聘教授”，开启了京陕两地教学研究的双兼顾时代。他在京时日既多，便只能远程指导我管理西大思想所的工作。书信、电话往来渐密。先生曾两度从北京来信，力劝我下定决心在职攻读他的博士研究生。信中的字迹苍劲有力，语意殷切，显然是他思虑已久才落笔的。可那时的我，竟未能经住世俗的诱惑，离开了我学习、工作十六年之久的母校，也离开了先生的身边。

那两封信，我至今还妥善地收藏着。偶尔翻出来看，字迹依旧，只是写信的人已经不在在了。如今，先生真的去了。山河含悲，文苑陨星。然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先生之思，泽被后世。我常常想起那些在西大的日子，想起那些深夜在二楼办公室的谈话，想起先生在讲台上不拿一片纸便侃侃而谈的风采，想起他亲口说“喜欢‘老师’这个称呼”时眼中闪过的光。他教给我的，远不止是学问，更是一种立身处世的姿态——无论身居何位，始终记得自己首先是个老师。

先生走了，但我总觉得他还在。在那间亮着台灯的办公室里，在那些泛黄的信纸上，在他编过的每一部教材的字里行间。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做我们的老师。

（注：作者系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原党组书记、主任，原文有删减）

（作者系西安石油大学党委副书记）

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侯外庐学派的主要成员和传承者、创新者张岂之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7月19日在西安逝世，享年100岁。张先生历任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校长、校长、名誉校长，是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陕西省首届社科名家、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会长，全球华人国学终身成就奖、汤用彤学术奖获得者。1994年起受聘清华大学，成为西北大学、清华大学的双聘教授。

侯外庐学派的传承创新

张先生是侯外庐的得力助手，直接参与了《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的编写，后来又协助主编《宋明理学史》，是公认的侯外庐学派第二代的核心人物和最主要代表，对侯外庐学派的传承与发展起到关键作用，撰写了中国当代思想史研究的新篇章。他认为对侯外庐先生的学术思想要保持一种自觉的反思意识，主张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照着讲”与“接着讲”相映照，强调侯外庐学派“特别注意解决前人未解决的历史疑难问题，具有打‘攻坚战’的勇气和魄力”，能够不断地发现新问题、提出新问题和解决新问题，是侯外庐学派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要继续解决中国思想史上一些尚未解决的疑难问题，如社会史分期的法典化标准中的制度变迁与生产力变迁的关系、政治法律制度变迁与经济制度变迁的关系等问题，不断开辟中国思想史研究日新月异的新空间。张先生传承并发展侯外庐学派“社会史与思想史结合”的传统，提出思想史研究“横通”（中西比较）与“纵通”（历史脉络）结合，强调思想史研究必须打破学科壁垒，经学、史学、哲学、文献学四维并观，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考察思潮变迁，从哲学、逻辑及社会意识多角度剖析思想家本质。经过长期的教学和研究实践，他深深体会到“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历史研究、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将“实事求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法结合，倡导“论从史出”，反对空疏之论，重视文献训诂与史实考证。他没有将思想史的研究局限在精英层面，而是将思想史研究与学术史、哲学史、科技史、文化史、民俗史相结合，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传统文学》《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思想学说史》等大型著作，都是沿袭侯外庐学派几代人通力合作、前后贯通的基本范式。他突破唯物与唯心、无神论与有神论、形而上学与辩证法“对子论”的简单对立框架，走向对中国思想文化更全面深入的客观分析，如在主编《宋明理学史》时，就系统梳理程朱陆王等“正统”哲学，深入分析其理论结构与历史作用，极大扩展了学派的包容性。他将思想史提升为“思想文化史”，揭示思想与文化的深层关联，明确提出“思想史是文化的核心”，主编《中国传统文学》《中华人文精神》等书，把哲学观念、价值理想、制度礼仪、社会风俗贯通起来考察，将中国思想史研究延展到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的解析与阐释。他重视儒学的“人学”思想体系、儒学的传统道德、儒学的理性主义、儒家“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大大拓展了侯外庐学

张岂之先生的治学育人思想

□ 韩 星

派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视角与领域，发扬了侯外庐学派善于决疑、善于创新的学风。

他提出“兼和、守正、日新”的学术准则，浓缩了他的治学思想与教育理念，成为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的所训。具体来说就是以“兼和”为基础，兼容并包与和谐统一相结合，要求学生视野宽广，既尊重中国思想学术自身特点，又参照西方成果；既精读基础文献，又关注新出史料与社会史背景，在多元观点中提炼逻辑体系。以“守正”为指导，要求学生做正派人、走正道，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强调“为人”与“治学”统一，反对浮躁学风，注重人品与学品并重。以“日新”为灵魂，主张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反对为古而古，泥古不化，主张学术研究需回应现实需求，从现实出发理解古代文明，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转化为与我们时代相衔接的思想文化，将历史研究与国家建设、民族复兴目标紧密联系起来。

甘为人梯 教书育人

张岂之先生一生是“甘为人梯，教书育人”八个字的生动写照。他不仅是著作等身的学术大家，更是一位将毕生心血奉献给讲台与学生的教育巨擘。他带领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团队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和博士后500余名，为中国思想文化研究领域输送了大量骨干人才，他的“人生历程始终没有脱离教师的身份，培养学生、从事管理和学术研究都围绕着‘教书育人’的轴心”，真正做到了从青春到白头，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教书育人事业。他谆谆寄语年轻老师：“作为一名教师，怎样才能把课讲好？你要把自己的‘心’投进去！”他以教学科研一体，坚信“教学与科研不可分割”，主张将自己的最新科研成果融入教学，并身体力行地用通俗的方式准确表达出来，“我总想有一点：既然是教师，做的一切就一定要对学生有用”，这是他教育理念最朴素的表达。在教学中他善于激发学生的文化使命感，主张教育不是单纯的知识灌输，而是唤醒学生的文化自觉。他常说“历史是民族的记忆”，教育学生要带着温情与敬意理解传统，使史学教育成为人格修养的基石。

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他严慈相济，对学术训练要求极高，力主通读原典，要求研究生打下坚实的文字训诂、历史文献、逻辑、外语基础，对学术规范要求严格。据他的学生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谢阳晖回忆，每次提交文章给先生审阅都“既喜且忧”。喜的是文章经先生仔细审改后质量大幅提升，忧的是不知要修改多少次才能“过关”；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教授肖永明也回忆说：“先生强调，思想史研究必须关注思想与社会的互动。他要求我们既

要精读基础文献、搜采稀见文献，也要关注新出文献，还要熟悉政治、经济、法律、民俗等方面的社会史料，拥有兼收并蓄的学术视野。”同时，张先生又非常平易近人，在教学中采取平等讨论、教学相长的方式，对待学术批评诚恳作答，常拿出自己未刊手稿请学生“挑刺”。他对青年学子重在鼓励，善于发现创新点并保护其积极性。他反对唯论文数量评价，注重科学素质与人格养成，培养整全而完善的“人”。他把学术与育人相结合，身体力行地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授给学生，确保学术价值能切实转化为教育价值。

张先生对中国教育弊端满怀忧患意识，关怀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是中国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发起者和推动者，是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顾问，发表了系列旨在加强人文精神教育的论文和讲演，并积极投身到人文素质教育的倡导、指导和管理行列，视人文学科为塑造精神世界的基础，在高校率先推动文理科必修“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提倡美育与德育融合，强调人的主体性与道德自觉，以此作为文化育人的理论基石，将人文教育不断推向“综合教育”“全面的教育”。他提出“自然科学是参天大树，人文科学是绿草，不起眼，却不可缺少”，以其思想、理念影响和推进中国的人文教育与科学精神的融合，倡导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提升学生的思维水准，树立健康的文化观和价值观，实现文化育人，培养具有健全人格与现代文明意识的知识分子，对中国高校人文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他担任西北大学校长期间，西北大学成为全国最早在研究生层次为文理科均开设必修课“中国传统文化”的院校。他受聘清华大学，推动成立了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是教育部1999年批准成立的第一批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基地成立以来明确以“全面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为中心，以提高大学生人文与科学素养为切入点”的素质教育指导思想，逐步建立起以文化素质课程为主渠道，课堂教学与校园文化活动、人文实践和大学文化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文化素质教育实施体系。他先后多次做客基地举办文化素质教育讲座专场，注重将自然科学与中国哲学精神相融合，坚持以文化人、以美人，倡导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融合的通识教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张先生指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提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规律的现代彰显，也是其在当代寻求新作为、服务于民族复兴伟业的现实需要。他一生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出“文化自信基于文化自觉”，认为研究历史是为了理清“我们从哪里来，向何处去”，让中华传统智慧在现代语境下焕发新的生命力。他提出在技术层面把古老的文化符号（如汉字、器物）用现代人易懂的方式呈现，但这只是转化的起点。在理论层面的核心工作是对古代典籍进行梳理、研究和阐释，把古人智慧的精华熔炼出来，与当代社会接轨，如他将儒家“和而不同”提炼为处理不同文明关系的智慧，将孟子的“人禽之辨”对接“人是目的”的哲学命题等。在价值观的升华层面，要对传统思想文化做既符合国情、又面向未来的价值提升，如古代的“以民为本”思想有其历史局限性，今天应将其提升到“以人为本”的高度，真正视人民为国家的主人和历史的推动者。应从“百家之学”中汲取溯本求源、天人合一、文化会通、经世致用、自强不息等精神养分，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以时代精神激活那些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与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在学术研究与通识教育教学中他概括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十二个核心理念：天人之际、道法自然、居安思危、自强不息、诚实守信、厚德载物、以民为本、仁者爱人、尊重重道、和而不同、日新月异、天下大同；提炼出中华人文精神七大精髓：人文化成——文明之初的创造精神；刚柔相济——穷本探原的辩证精神；究天之际——天人关系的艰苦探索精神；厚德载物——人格养成的道德人文精神；和而不同——

博采众家之长的文化会通精神；经世致用——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精神；生生不息——中华人文精神在近代的丰富与发展。这些为理解中华文明精神内核、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了完整的理论框架。张先生还长期主持和指导陕西省轩辕黄帝研究会、黄帝文化论坛等，并亲临大会，发表主旨演讲，在黄帝与黄帝陵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和精神研究与普及等领域取得显著成绩，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张先生作为学界大家，反对将传统文化束之高阁，非常重视传统文化普及工作，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编写高质量教材与普及读物，明确提出要让中华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他认为，这是社会的迫切需要，学者不能因其小而不为：“思想文化史研究需要很专业的研究成果，也需要高质量的普及读物，否则就会使自己与时代、与社会、与大众隔绝，怎能实现‘以文化人’？”他以人文精神为内核，以学术研究为根基，以生活践行为归宿，将学术成果通俗化以服务社会大众，发挥“以文化人”的社会功能，具体途径有三：一是生活化，将传统文化融入家风家教、婚丧嫁娶、节日节气，成为社会公序良俗的源头活水；二是制度化，把人文精神转化为行为准则，如“诚信”进入市场体系，成为契约精神的道德支撑；三是坚守文化主体性，在知己知彼中平等对话，既不孤芳自赏，也不全盘西化。他特别警示要警惕“国学娱乐化”和“泛文化”现象，反对以弘扬传统文化之名行赚名利之实，并对“文化学者”等泛化标签保持警惕，强调学术的严谨性。

总之，张岂之先生自喻为“拓荒石匠”，以侯外庐先生“乐此不疲”自勉，七十余载坚守讲台与书斋，视学术传承与人才培养为天职，是对“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最佳诠释。他以史学家之求真、思想家之致思、教育家之赤诚，为中华文脉的延续与创新贡献了毕生心力，其德范长存，永励后学。

（注：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



作者（右一）与同学一起看望张岂之先生

张岂之先生教育管理理念与实践

□ 郑 熊

张岂之先生作为一个教育家，不仅有自己的教育管理经验，同时还把它们付诸实践，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相长。张先生的教育管理理念归纳起来就是以人

为本，充分发挥校长的主观能动性，结合学校实际、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制度。张先生把教育管理理念付诸实践，与他作为西北大学副校长（1983年9月—1985年4月）、校长（1985年4月—1991年9月）的身份分不开，这几年重要经历，进一步促进了教育理论的发展。

锐意改革
试行校长负责制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改革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就教育方面来说，1985年5月27日发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针对“在教育事业管

理权限的划分上，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主要是对高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应有的活力；而政府应该加以管理的事情，又没有很好地管起来”的问题，提出必须“改革管理体制，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决定》为试行校长负责制提供了政策依据，指明了行动方向。此政策发布前，西北大学已经开始了一系列相关尝试，改革呼声很高。

正是在内部和外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西北大学准备试行校长负责制。西北大学的想法得到了上级的支持，中共陕西省委科教部发文，同意西北大学从1985年9月开始试行校长负责制，由校长全面负责学校的行政事务。为了与之相适应，进一步健全行政管理机构，逐步实现管理的专业化、科学化，学校设立了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作为学校审议机构，同时设立了学位委员

会、学位评定委员会等，还进一步提高了系主任、所长的权利，系和所实行系主任、所长负责制。

校长负责制

联合办学争取多方支持
促进综合发展

教育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发布的《高等学校接受委托培养学生的试行办法》指出：“按现行管理体制，高等学校在保证完成国家下达的指令性招生计划的前提下，试行委托培养学生的办法，可以发挥高等学校的办学潜力，开辟高等学校经费来源，加强学校和用人单位的联系与合作，打通高等学校为城乡集体所有制单位及个体户培养专门人才的路子，推动高等教育的改革，达到增加培养数量，提高教育质量，更好地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专门人才的实际需要的目的。”张先生快速响应号召，积极推行西北大学联合办学。

联合办学涉及众多类型的外单位的合作。西北大学联合办学主要表现为几种方式：第一种是为外单位培养人才，由外单位负担培养学生所需的基本建设投资和日常费用；第二种是与外单位联合兴办新的院系，为外单位定向培养专业人才；第三种是西北大学在学生毕业后，按照外单位的需求，直接分配学生到外单位，外单位

根据实际情况向西北大学提供必要的资助；第四种是与外单位联合办培训班、培训社会人士。

联合办学极大促进了西北大学的发展。特别是同石油化工部的合作，以及同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共同兴办的人才，带来了化学、化工专业的突飞猛进。在这种情况下，就学校发展方向，或者说办学定位，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有一种看法是西北大学应该抓住来之不易的机会，建设成以某一专业为核心的单一性大学，同时辅助其他相关专业。张先生明确指出，西北大学的发展只能走综合大学的路，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西北大学的优势，才能称为西北大学。

争取校外资金
全面改善办学条件

张先生任职校长的几年中，想方设法从外校争取资金，全面改善办学条件，促进西北大学发展。争取校外资金的方式大概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就是通过前面所讲联合办学的方式，为外单位培养所需人才，同时外单位给西北大学一定的资助。联合办学带来了相当丰厚的办学资金。

第二种，寻求上级支持，获得国家以及陕西省的拨款。1984年，陕西省人民政府将《关于请求对我省西北大学安排基建投资的请示》上报国务院，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安排落实。1985年，陕西省计委致函国家计委，请求给西北大学拨1800万元补助基建投资，国家计委原则同意。

第三种，充分利用各种机会，从社会各界获得资助。在这种形式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获得邵逸夫先生捐赠的1000万港元。1986年上半

年，邵逸夫先生表示，愿意向国内十所高等学校捐款一亿港元，后经过国家教育委员会的研究，并经过邵逸夫先生的选定，初步确定包括西北大学在内的十所高等学校来接受这笔捐款。西北大学提交的项目建议单为新修15000m2的图书馆。

第四种，向银行贷款，特别是向世界银行贷款。根据陕西省教育局《关于申请解决西北大学接受世界银行贷款需要国内配套资金的报告》，学校贷款250万美元，国内配套资金人民币700万元。

完善规章制度
逐步实现管理的专业化、科学化

张先生在西北大学的发展中，不仅关注硬件建设，更加注重学校的软件建设，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出台就是明证。20世纪80年代中叶到90年代初，学校规章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首先，在行政方面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既包括行政程序方面的，还包括一些具体行政事务的。比如，1985年9月26日，西北大学召开校务委员会成立暨第一次会议，张先生主持并讲话，会议讨论制定了《西北大学校务委员会章程（讨论稿）》。

第二，作为学校主体的教师和学生，是制定制度时必须关注的。西北大学制度的制定，在这方面是比较明显的。就教师方面来说，如1984年7月5日，西北大学公布实施《西北大学教师工作暂行实施细则》。就学生方面来说，主要集中在研究生制度的制定上，如1984年11月25日的《西北大学关于聘请校外兼职指导教师暂行规定》，1985年6月30日的《西北大学关于接受校外毕业研究生申请硕士学位的规定》。

第三，随着联合办学的试行以及科研项目的申请，西北大学经费不断增多，如何有效地管理经费，有待制度的出台。1984年2月23日校行政会议讨论通过的《西北大学增收节支基金使用奖励试行办法》和《西北大学科研经费管理试行办法》，1985年11月16日的《西北大学基金暂行管理办法》，1986年5月26日的《西北大学专利管理办法》《西北大学专利事务所专利代理及收费的暂行办法》等，都与经费管理相关。

第四，后勤作为学校一部分，为学校日常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必要的保证。为此，制定相关后勤的规章制度也是非常必要的。1985年11月21日的《关于校内交通安全、门卫、消防管理的暂行规定》，1985年12月13日的《治安保卫工作责任制暂行规定》，1988年1月3日的《西北大学后勤改革领导小组工作条例（试行稿）》等，都与后勤工作相关。

第五，其他方面。1988年1月6日，《西北大学实验管理委员会章程》公布施行。1989年3月25日，《西北大学计算机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公布实施。1990年11月14日，《西北大学档案管理办法》公布实施。

总之，张先生任校长的几年中，以国家政策为指导，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都是其教育管理理念实践的表现。此外，张先生还创立了新闻记者招待会、宣传学校，让外界了解和支持学校。1987年1月24日，西北大学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邀请了中央驻陕和省、市新闻单位25位记者，张先生介绍了近几年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变化。这个制度，后来一直被保留下来，成为西北大学宣传自己、外界了解西北大学的途径之一。

（作者系中国思想史研究所教授）



作者（右一）与张岂之先生在一起